



大会

Distr.: General
18 July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在本报告中，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艾丽斯·吉尔·爱德华兹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7 号决议第 1 段(g)分段，介绍了她对各种趋势和动态的年度概述，以及一份侧重于调查、起诉和防止战时性酷刑方面的良好做法和挑战以及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康复服务的专题研究报告。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考虑战时和其他类似安全局势中的性侵犯问题时，酷刑框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对幸存者、而且也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尤其如此，并提出了一项行动呼吁。报告最后提出了若干建议。

* A/79/150。



一. 趋势和动态

1. 2024 年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获得通过二十周年。该条约是减少这种野蛮做法的最有效的国际文书，正在接近获得普遍批准，已经有 174 个缔约国。¹ 特别报告员欢迎图瓦卢加入，并祝贺欧洲、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已经实现了区域层面的普遍加入。她赞扬禁止酷刑公约倡议在领导这场运动方面做出的努力。

2. 斯洛伐克和刚果加入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布基纳法索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防范机制，巴西建立了两个地方防范机制。

3. 特别报告员欢迎科特迪瓦修订《刑法》，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酷刑行为视为犯罪。至少有 39 起酷刑案件已经或正在通过普遍管辖权进行起诉，涉及多名罪犯。² 虽然对酷刑的起诉和定罪数量正在增加，但许多国家仍然没有对酷刑指控进行调查。在欧洲人权法院最近就中央情报局移解问题对立陶宛作出判决之后，³ 她对一些国家就以前的裁决进行的有限国内刑事诉讼表示悲叹。

4. 在过去一年里，武装冲突中酷刑和其他践踏人的尊严的暴行一直在惊人地增加。任务负责人收集的证据表明，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残忍行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恐吓、灌输恐惧、惩罚或获取信息和供词(A/HRC/55/52/Add.1)。在苏丹，主要交战方正在进行系统的运动，其中包括任意逮捕、拘留、酷刑和虐待平民。

5.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令人信服地表明，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其中包括杀戮、劫持人质、酷刑和性酷刑。⁴ 特别报告员就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指控与以色列进行了交涉。⁵ 她欢迎以色列高级法院下令关闭 Sde Teiman 军事拘留营的决定。

6. 特别报告员欢迎国际法院于 2023 年 11 月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布的具有约束力的紧急临时措施，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并保

¹ 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家有：巴巴多斯、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签署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克、海地(签署国)、印度(签署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牙买加、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缅甸、帕劳(签署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卢西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

² 穷追未受惩罚者国际组织和补救，《2024 年普遍管辖权年度审查》，(2024 年)。

³ 欧洲人权法院，Al-Hawsawi 诉立陶宛，第 6383/17 号申请，2024 年 4 月 16 日。

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un-experts-demand-accountability-victims-sexual-torture-and-unlawful>。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5/israel-un-expert-calls-probe-allegations-torture-and-mistreatment-against>。

存证据。然而，她收到了关于该国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大量现时指控。她呼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从速遵守临时措施。⁶

7.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特别与下列国家的冲突有关的酷刑案件的来文并/或进行了干预：阿富汗、阿塞拜疆、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印度、伊拉克、肯尼亚、利比亚、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卢旺达、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和也门。

8. 今年选举中出现的专制主义的大趋势令人担忧。最近抗议活动的驱动力是对政治变革的渴望、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以及对全球事件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和平抗议受到过度武力或暴力的管制。在过去一年中，特别在下列国家发生了导致暴力的抗议活动：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白俄罗斯、科摩罗、刚果、格鲁吉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约旦、肯尼亚、科索沃、⁷ 马达加斯加、墨西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塞内加尔、塞尔维亚、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

9. 特别报告员欢迎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撰写的《执法人员和平抗议中促进和保护人权示范议定书》(A/HRC/55/60)。

10. 提请各国注意，特别报告员在其上一次报告(A/78/324)中呼吁达成一项全球协定，对执法机关和其他公共机关广泛使用的可用于施加酷刑的武器、工具和设备的贸易进行管制。需要恢复外交活力。在非法酷刑工具被发现在巴黎的一个武器展销会上出售后，她写信给法国。⁸ 任务负责人将继续在全球监测武器展销会。

11. 用于镇压异议和政治反对派的酷刑和恐吓仍在继续。特别报告员已经在多个案件中进行了干预。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在俄罗斯联邦被拘留期间死亡，这对人权来说是一个黯淡的日子。⁹ 本任务负责人仍然对中国香港采用黎智英案中的证据深感担忧，据称这些证据是在中国通过酷刑获得的。¹⁰ 虽然朱利安·阿桑奇获释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宽慰，但特别报告员鼓励美国更新其间谍和引渡法，

⁶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7/torture-allegations-continue-syria-despite-icj-order-un-expert>。

⁷ 提及科索沃时，应结合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加以理解。

⁸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6/ahead-major-security-trade-fair-paris-un-torture-rapporteur-requests-france>。

⁹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russia-un-experts-call-accountability-navalny-death-and-immediate-release>。

¹⁰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hong-kong-sar-un-expert-warns-against-admission-evidence-allegedly-secured>。

纳入对记者和举报人的保障措施。¹¹ 苏里南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对前总统德西·鲍特瑟的酷刑和法外处决监禁判决，这一决定受到欢迎。¹²

12. 镇压人权维护者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重大趋势，特别报告员已经收到了特别关于下列国家的案件的资料：阿塞拜疆、柬埔寨、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巴勒斯坦、缅甸、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只占进行这种镇压的国家的一小部分。使用“人质外交”的问题也令人不安，将是本任务的一个持续重点。特别报告员已经代表在阿富汗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Ryan Corbett** 进行了干预。¹³

13. 正如特别报告员最近关于全球监狱状况的报告(A/HRC/55/52)所指出的，在所有区域，有太多的人被长期监禁在严重拥挤的设施中。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的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保护公众而实行的不确定判决随后被废除，但继续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并造成心理上的折磨。¹⁴ 即将上任的政府必须结束这种不公正现象。巴西最高法院就监狱中普遍存在的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作出裁决，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迅速制定必要的全国行动计划，制止虐待行为。¹⁵ 她欢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决定停止对被拘留者使用不人道的口水罩。¹⁶ 她还知悉，在意大利米兰，有 13 名狱警因被控在青少年中心实施酷刑而被捕。¹⁷ 她与禁止酷刑委员会一样，对丹麦与科索沃之间关于将外籍囚犯安置在科索沃的条约表示关切。¹⁸

14. 妇女和女童遭受针对性别的严重酷刑和其他虐待的风险仍然很高。她们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阿富汗的公共生活之外，这增加了她们面临暴力的风险。在加沙，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摧毁了为产妇提供适当医疗服务的能力。¹⁹ 在美国，生

¹¹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6/1151436>。

¹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suriname-un-experts-welcome-landmark-ruling-against-former-president-desire>。

¹³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6/afghanistan-detained-american-aid-workers-life-risk-if-no-urgent-medical>。

¹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8/uk-un-torture-expert-calls-urgent-review-over-2000-prison-tariffs-under>。

¹⁵ 见 <https://www.cnj.jus.br/sistema-carcerario/plano-pena-justa/>。

¹⁶ 见 <https://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media-releases/commission-welcomes-banning-spit-hoods-afp>。

¹⁷ “意大利因 13 名狱警涉嫌虐待未成年人而逮捕他们”，路透社，2024 年 4 月 22 日。

¹⁸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丹麦第八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AT/C/DNK/CO/8，2023 年 12 月 8 日，第 16 段。

¹⁹ 见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1/1145317>。

育限制仍在继续，有 14 个州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²⁰ 美国参议院阻止获得避孕药具的联邦权利的决定令人遗憾。

15. 长期以来，死囚等待受刑一直被视为一种不人道的待遇。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美国和也门执行死刑的严重指控。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用实验式的吸入氮气方式对 **Kenneth Eugene Smith** 进行处决是一个可怕的事态发展。²¹ 特别报告员欢迎伊朗法院决定推翻对说唱歌手 **Toomaj Salehi** 的死刑判决，只是他仍被拘留，应该被释放。²² 刚果在 20 年后恢复死刑是一种退步。²³

16.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禁止驱回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她对一些国家将叙利亚人遣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计划表示关切。²⁴ 特别报告员还对利比亚难民的处境感到担忧，据称他们被关押并遭受酷刑。²⁵ 特别报告员与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致函航空公司和航空当局，警告他们不要为从联合王国非法转移到卢旺达提供便利。²⁶ 即将上任的联合王国政府立即决定撤销不人道的庇护转移计划，这一决定受到欢迎。澳大利亚将最后一名难民从瑙鲁离岸处理设施的恶劣条件中撤离的行动是短暂的，据称该岛目前收容了 100 名或更多的寻求庇护者。²⁷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关于无限期移民拘留制度属于非法的判决受到欢迎。²⁸

²⁰ “提振路易斯安那州”组织、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生殖健康影响”组织以及生殖权利中心、对被刑事定罪者的照护：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禁令如何危及病人和临床医生。2024 年 3 月。

²¹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united-states-un-experts-horrified-kenneth-smiths-execution-nitrogen-alabama>。

²²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4/iran-un-experts-alarmed-death-sentence-imposed-rapper-and-songwriter-toomaj>。

²³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4/03/drc-reinstating-executions-shows-a-callous-disregard-for-human-rights/>。

²⁴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syrian-returnees-subjected-gross-human-rights-violations-and-abuses-un>。

²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3/07/libya-un-experts-alarmed-reports-trafficking-persons-arbitrary-detention>。

²⁶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4/uk-airlines-and-aviation-authorities-should-not-facilitate-unlawful-removals>。

²⁷ 本·多尔蒂：“‘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瑙鲁拘留中心空无一人。现在有 100 名寻求庇护者被关押在那里”，《卫报》，2024 年 6 月 12 日。

²⁸ 见 <https://humanrights.gov.au/about/news/media-releases/commission-commends-high-court-ruling-indefinite-immigration-detention>。

二. 调查、起诉和防止战时性酷刑，并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康复服务

本报告载有关于可能触发受害者和幸存者强烈情绪反应的性酷刑和性暴力的描述和信息。

A. 引言

17. 性酷刑是对另一个人施加力量的最终手段。它会留下伤害后代的长期创伤。其后果可能是情感、创伤、生理、生殖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通过性化形式的酷刑，施害者的目的是直接伤害受害者，攻击受害者的家人，威胁同一种族、宗教或社区的其他成员，并摧毁其“敌人”的意志。²⁹ 从性酷刑中恢复需要专家的护理和关注。

18. 特别报告员对当今战争和其他不安全局势中性酷刑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感到震惊。在过去一年里，性酷刑的报告相当多，而且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苏丹指控 2024 年初发生数百起强奸妇女事件。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领导的对以色列的袭击提供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发生了强奸和残割生殖器的行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的战斗升级，其中就包括令人震惊的强奸和其他性侵犯罪。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士兵和平民实施的系统性酷刑，包括近 300 起据称对妇女和男子实施性酷刑的未决案件。

19. 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还载有关于性酷刑的资料，特别是在阿富汗、阿塞拜疆、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几内亚、伊拉克、肯尼亚、利比亚、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卢旺达、斯里兰卡、乌干达、也门和前南斯拉夫。

20. 鉴于这些形式的酷刑的严重程度——以及往往伴随而来的完全有罪不罚现象——特别报告员呼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令人震惊的罪行。战争中的性酷刑为何如此频繁？为什么各种努力未能阻止性酷刑？为什么起诉这么少？通过禁止酷刑来界定性暴力有什么好处？

21. 交战各方实施的性侵犯罪几乎都是酷刑。性酷刑是为审讯、惩罚、恐吓或歧视等目的故意施加的一种被禁止的剧烈疼痛或痛苦。³⁰ 性酷刑或性化酷刑是侵入和侵犯一个人的私密或私人部位的任何言语、情感、心理和/或身体攻击。

22. 性酷刑和侵犯人的尊严的类似暴行包括强迫裸体、口头辱骂和性威胁、强迫手淫或排尿、身体创伤、电击、残害或以生殖器、生殖器官或乳房为袭击目标、强奸(涉及手指、物体或阴茎插入)、奴役、假阉割或真阉割、以及强迫堕胎、

²⁹ 在本报告中，“受害者”和“幸存者”这两个词可互换使用。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些受害者在遭受性酷刑后死亡，而有些幸存者选择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她还指出，这些术语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也可能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

³⁰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全球公认定义的摘要形式)。

怀孕或绝育。³¹ 这些侵犯行为旨在造成最大程度的羞辱和残忍。在极端情况下，性酷刑可能是政治和/或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23. 妇女和女童首当其冲地受到男性士兵和其他男性施害者在男性领导人指挥下对女性身体实施的性酷刑。她们还面临强迫怀孕、性奴役、分娩和抚养因强奸而生的孩子，而这可能导致家庭或社区的排斥。妇女和女童也可能因所谓的“耻辱”而被杀害、残害、毁容或谋杀。她们可能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生殖功能。女兵一旦被俘，极有可能遭受性侵犯，并且她们在自己的队伍中也往往面临危险。有时，妇女也会作为施害者参与其中。

24. 男子和男童也是受害者，其程度可能从未完全透露过。对他们实施性酷刑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羞辱、支配、剥夺他们的人性和尊严。一些军队试图通过性侵犯和羞辱使敌人“女性化”，而这往往利用文化或宗教准则。性犯罪的施害者绝大多数是男性。

25. 还有报告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遭到了性酷刑。《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显示，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了对同性恋者和性别表现不一致者进行的实验。在将同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的国家，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受害者面临受到惩罚的风险。

26. 儿童是性虐待的最脆弱受害者。性酷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身体伤害。它扰乱了儿童的发展和教育，造成长期的情感和心理困扰。受害者面临社区和家庭的污名化、歧视甚至排斥。他们迫切需要专门的康复方案，即使在他们成年后也是如此。有时，儿童被迫成为施害者，并且后来与自己的行为做斗争。据报道，自残和自杀的发生率很高。

27. 今天的战争是在战场上和媒体上进行的。否认、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宣传在我们破碎的媒体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它们直接影响对性酷刑的报道。指控被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操纵或歪曲证据是一种战争策略。社交媒体使得调查和确定真相变得非常复杂。这也让许多害怕公众监察的幸存者保持沉默。

28. 通过本报告，特别报告员设法持续聚焦于这些令人震惊的侵犯行为，并探讨酷刑框架对于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和获得补救的好处。由于很少有人能够实现正义或赔偿，本报告载有一个重要的关于预防的章节。

29. 特别报告员非常感谢所有提供材料的方面。共有 46 份提交材料，共来自 7 个国家。³² 来自所有区域的专家和从业人员在 5 月份参加了在线协商。她非常感谢酷刑受害者康复国际理事会为本报告的具体章节提供材料，并感谢吉扬人权

³¹ 如需查阅更长的具体形式列表，参见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2022 年，第 455-459 段。

³² 以下国家提交了材料：萨尔瓦多、德国、以色列、挪威、乌克兰、赞比亚和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所有提交的材料均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4/identifying-documenting-investigating-and-prosecuting-crimes-sexual-torture>。

基金会、公正赔偿联盟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幸存者，他们在特别报告员 6 月对伊拉克北部进行考察访问期间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B. 将性酷刑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起诉

30. 性酷刑与所有其他形式的酷刑一样，是国际法严格禁止的(A/77/502, 第 29 段)。³³ 性酷刑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甚至种族灭绝罪。在战争或其他安全或恐怖主义背景下的性暴力也可构成酷刑罪，无需进一步的限定要素。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存在着一种压倒性的共识，即把强奸和其他形式的严重程度相当的性侵犯具体化为被禁止的酷刑形式，作为强行法。

31. 1625 年，雨果·格劳秀斯的《和平下的战争法》是第一部将国际战争法系统化的全面著作，其结论是，强奸被称为“对妇女的侵犯”，“在战争中与在和平时期一样，不应不受惩罚”。³⁴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和东京战争罪审判中被忽视，但禁止强奸和其他性侵犯以及保护妇女不受强迫卖淫和猥亵攻击的规定，从 1907 年起就被列入国际人道法的多个组成文书。³⁵

32. 到 1990 年代中期，在海牙起诉的第一批性犯罪中，有许多涉及对男性的性犯罪，这些犯罪被指控为酷刑或其他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正如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在检察官诉 Jean-Paul Akayesu 案中所指出的，性侵犯与酷刑具有相同的性质：“与酷刑一样，强奸也被用于恐吓、侮辱、羞辱、歧视、惩罚、控制或毁灭人等目的。与酷刑一样，强奸是对个人尊严的侵犯。”³⁶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认为，强迫男性囚犯相互进行性行为，³⁷ 以及强迫人们观看其他人被强奸，³⁸ 均构成酷刑或残忍和不人道的待遇。

33. 今天，各种类型的性侵犯被作为酷刑或明确列举的性暴力犯罪之一予以起诉。国际刑事法院认定，对被绑架妇女的强奸和性暴力构成酷刑，是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³⁹ 检察官办公室关于基于性别的犯罪的政策规定，“酷刑罪也可以通过性暴力、生殖暴力和其他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实施，如果这些行为使受害

³³ Alice Edwards, 《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219-227 段。Patricia V. Sellers, 《根据国际刑法和人道法, 性酷刑是一种罪行》, 《纽约城市大学法律评论》, 11: 2, 2008 年, 第 339-351 页。

³⁴ Kelly Dawn Askin, 《侵害妇女的战争罪: 在国际战争罪法庭上的起诉》(Martinus Nijhoff, 1997 年), 第 30 页。

³⁵ 同上。

³⁶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检察官诉 Akayesu, ICTR-96-4-T, 1998 年 9 月 2 日判决, 第 687 段。

³⁷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检察官诉 Tadić, IT-94-1-T, 1997 年 5 月 7 日判决, 第 206、726 和 730 段。

³⁸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检察官诉 Furundžija, IT-95-17/I-T, 1998 年 12 月 10 日判决, 第 266-269 段。

³⁹ 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诉 Ongwen, ICC-02/04-01/15, 2021 年 2 月 4 日判决书, 第 3072-3077 段。

者在施害者的监管下和/或控制下遭受严重疼痛和痛苦的话……可以对这些行为进行累积起诉，并相应地进行累积定罪”。⁴⁰

34. 安全理事会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性犯罪的关注，以及妇女在和平谈判和恢复工作中的代表性和领导作用的特殊重要性。⁴¹

35. 每一个国际和区域人权机构(法院和委员会)都将强奸和其他严重程度相当的性侵犯行为视为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优先考虑战争暴力的受害者。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士兵的轮奸行为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⁴² 禁止酷刑委员会通过其个人来文程序，定期防止驱逐面临性酷刑威胁的个人。⁴³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确认，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可构成酷刑(CEDAW/C/GC/35, 第 16-18 段)。儿童权利委员会认识到，儿童在武装冲突期间极易受到伤害，并且酷刑包括性虐待(CRC/C/GC/13, 第 3 (i)、4、25、26 和 72(g)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已经发布准则，确认与性别有关的迫害是获得难民地位的一个理由。⁴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认为，强奸行为和未能防止这种行为违反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5 条。⁴⁵ 美洲人权法院认为，国家官员的强奸行为是一种心理酷刑，违反了《美洲人权公约》第 5 条。⁴⁶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包括强奸在内的身体和精神暴力行为单独或累积起来构成酷刑，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3 条。⁴⁷

36. 在国家一级，在 108 个在刑法中规定了具体的酷刑罪的国家中(A/HRC/52/30, 第 36 段)，没有多少国家明确将性犯罪列为酷刑，这助长了有罪不罚现象。不承认战时的性行为是酷刑，显然导致作为普通强奸罪或性侵犯或猥亵罪进行指控和起诉，而这些罪行的处罚通常比酷刑轻得多。这些罪行还可

⁴⁰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关于基于性别的犯罪的政策，2023 年 12 月，第 58 段。

⁴¹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联合国秘书长与暴力有关的性暴力报告》，2024 年 5 月 24 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1820 (2008)、1888 (2009)、1960 (2010)、2106 (2013)、2242 (2015)、2467 (2019)号决议。另见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19 (1992)号一般性建议、关于妇女参与预防冲突的第 30 (2013)号一般性建议和关于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 35 (2017)号一般性建议，后两项建议更新第 19 号一般性建议。

⁴² Purna Maya 诉尼泊尔，CCPR/C/119/D/2245/2013，2017 年 6 月 23 日，第 12.4 段。

⁴³ Bakatu-Bia 诉瑞典，CAT/C/46/D/379/2009，2011 年 7 月 8 日，第 10.6-10.8 段；E.K.W 诉芬兰，CAT/C/54/D/490/2012，2015 年 6 月 25 日，第 9.5 段；A.Sh 等人诉瑞士，CAT/C/63/D/717/2015., 第 9.7 段。

⁴⁴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1951 年《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乙)项和/或其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所涉的与性别相关的迫害行为，HCR/GIP/02/01，2002 年 5 月。

⁴⁵ 非洲委员会、苏丹人权组织及维护住房权利反对驱逐房客中心诉苏丹，第 279/03-296/05 号文，2009 年 5 月，第 157 段。

⁴⁶ Raquel Martin de Mejia 诉秘鲁，第 10.970 号案，第 5/95 号报告，1996 年 3 月 1 日。

⁴⁷ Aydin 诉土耳其，第 57/1996/676/866 号申请，1997 年 9 月 25 日，第 83-87 段。

允许以上级命令、时效法和国家元首豁免为理由进行辩护，而这些不适用于酷刑罪。

37. 芬兰、肯尼亚、尼日利亚、巴拉圭、菲律宾和乌干达等国的刑法明确承认强奸和性虐待构成酷刑。将实施强奸和性暴力行为视为加重处罚的酷刑情节的国家包括巴西、布隆迪、吉布提、厄瓜多尔、法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墨西哥、摩洛哥、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

38. 赞比亚承认，如果没有关于管制武装冲突中的性酷刑的明确规定，在追究施害者对其行为的责任方面可能存在挑战。⁴⁸ 乌克兰鼓励检察官将性酷刑行为指控为性暴力和酷刑。⁴⁹ 萨尔瓦多制定了一项起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政策，其中具体规定了如何将性暴力作为一种酷刑形式，并制定了一份文件记录和调查手册，其中适用了《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⁵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对性形式的酷刑行使普遍管辖权。⁵¹

39. 规范军事行为是防止性酷刑的基本保障。许多国家已经照搬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习惯国际人道法第 93 条规则，该规则明确禁止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在这些罪行中，许多国家的军事手册都规定禁止强奸、强迫卖淫和猥亵，其中许多手册明确规定这些行为构成战争罪。⁵² 需要解决民法和军法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以免造成管辖权方面的挑战，从而可能拖延或阻碍调查，⁵³ 或导致相反的结论。⁵⁴

C. 将耻辱和污名转嫁给施害者

40. 耻辱和污名仍然与各种性暴力有深刻的联系，并延伸到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是阻碍恢复、康复和司法的关键因素。对幸存者的广泛影响和幸存者的痛苦的复杂性往往因多重创伤经历而变得更加复杂。⁵⁵ 在广大社区进一步加以污

⁴⁸ 赞比亚提交的材料。

⁴⁹ 乌克兰提交的材料。

⁵⁰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⁵¹ 德国提交的材料。另见穷追未受惩罚者国际组织，《2023 年普遍管辖权年度审查》，第 51 页和第 56-58 页。

⁵² 例如，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克罗地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多哥、乌干达、联合王国和美国。

⁵³ 尼日利亚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⁵⁴ Miguel Agustín Pro Juárez 人权中心(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⁵⁵ Tobias Kube, Anna Caroline Elssner 和 Phillip Herzog, “多重创伤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认知关联方面的证据”,《欧洲心理创伤学学刊》, 14(1), 2023 年。

名化的情况下，性暴力造成的创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⁵⁶ 并与抑郁、焦虑和创伤等症状的显著增加有关联。⁵⁷

41. 性暴力的耻辱或污名必须完全由施害者承担。遭受酷刑并不可耻。性酷刑并不可耻。受害者和幸存者不应为他们所遭受的暴力而遭受指责。同样，丈夫或父亲或其他亲属可能承担了无法“保护”其所爱之人的负担，也不应承担责任。必须改变讨论和看待污名的方式，以消除受害者、其家庭或社区的任何隐含责任。

42. 酷刑的强行法性质是毫不含糊的。通过酷刑框架来处理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的耻辱和污名就被消除，完全由本来应该承担的人——施害者和怂恿他们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承担。这些人包括那些明示或暗示允许性酷刑的当权者，例如，通过加强社会分裂和非人性化煽动仇恨，或通过使犯罪不受惩罚，而袖手旁观并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43. 政治、宗教和其他领导人可在改变社会对受害者的态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伊拉克，2014年9月，雅兹迪精神领袖巴巴·谢赫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欢迎从伊斯兰国囚禁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返回，这大大有助于减少社会耻辱，并对受害者、其家人和社区的愈合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伊拉克其他社区的幸存者没有得到同样的拥抱，因此承受着社会排斥的额外负担。在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一些信仰组织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提供食物、住所、安抚和职业培训来帮助被遗弃的幸存者。⁵⁸ 在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战争受害者能够在不受评判的情况下讨论他们的经历，包括性化酷刑的经历，同时得到康复支助(A/HRC/55/52/Add.1，第96段)。

44. 在由幸存者牵头的《关于与暴力有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幸存者和受害者获得赔偿和共同创造的权利的金沙萨宣言》中，⁵⁹ 非洲12个国家的冲突幸存者宣布，赔偿方案应解决歧视性和污名化的禁忌。他们还宣布，幸存者必须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共同创造者”。仅仅征求幸存者的意见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是利益攸关方——康复的设计者、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接受者。作为特别报告员2023年“愈合与正义听证会”的成果，来自拉丁美洲13个国家的酷刑幸存者通过了《波哥大宣言》，他们在宣言中要求受害者参与制定关于酷刑的公共政策。他们强调，他们“厌倦了被视为罪犯、破坏分子或恐怖分子，他们与家人一起不得不逃离家园和领地，并且由于担心报复、失去生命或不断的耻辱而不能返回”。⁶⁰

⁵⁶ An Verelst, Maarten De Schryver, Eric Broekaert 和 Ilse Derluyn, “刚果东部性暴力受害者的精神健康：与日常压力源、耻辱和贴标签的关联”，《BMC 妇女健康》，14:106，2014年，第1-12页。

⁵⁷ Sarah McIver Murray 等人，“刚果性暴力幸存者中的污名问题：规模发展和心理测量学”，《人际暴力行为学刊》，33(3)，2018年2月，第491-514页。

⁵⁸ 久比利活动社提交的材料。

⁵⁹ 见 <https://www.globalsurvivorsfund.org/latest/resources/kinshasa-declaration/>。

⁶⁰ 见 <https://ir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2Declaracioen-de-sobrevivientes-y-viectimas-de-tortura-en-Bogotae-2.pdf>。

D. 低报和延迟透露

45. 特别报告员在上一份报告(A/HRC/52/30)中指出的有效调查和起诉酷刑的障碍、阻碍和挑战对调查性酷刑有切实意义，应结合本报告阅读。然而，伤害的性化性质和战争的背景提出了具体的挑战。

46. 专家们的共识是，战争中的性酷刑通常被低报了。据估计，在每一起报告的战时性暴力案件中，还有多达 20 起案件没有记录和处理。⁶¹ 如果报告了性酷刑，也是在后期才报告的。这使数据收集以及暴行规模和性质分析工作复杂化，影响了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47. 由于性酷刑在现代武装冲突中几乎无处不在，特别报告员认为，当局应该有一个可行的假设，即性酷刑正在发生。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做出反应、收集和保存证据以及为受害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的能力。当局还应注意许多指标，例如紧急避孕(A/HRC/55/52/Add.1, 第 44 段)以及怀孕和性传播感染检测的需求大幅增加。⁶²

48. 战争无疑为举报制造了障碍。民众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优先于举报犯罪。⁶³ 被占领土上的受害者可能无法与执法部门联系。⁶⁴ 可能没有程序或安全地点可供举报。施害人可能身居要职，而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可能被关押。调查人员可能与敌人有关联。⁶⁵ 说出来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监测机构可能无法接触受害者。⁶⁶ 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可能难以理解不同的法律制度、文化或语言。⁶⁷

⁶¹ 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在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会外活动“防止和解决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上的讲话，该活动由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寻求共同点组织、乔治敦妇女、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共同主办，2021 年 9 月 29 日。另见 Elizka 救济基金会提交的材料，其中评估说，苏丹记录在案的性侵犯指控仅占实际案件的 3%。

⁶²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冲突中性暴力文件记录和调查冲突中性暴力事件备案和调查国际议定书国际议定书》，第二版，2017 年 3 月，第 228 页；《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预警指标汇总表》，2022 年 3 月 25 日，第 19 页。

⁶³ 巴勒斯坦国常驻观察员代表团提交的材料。

⁶⁴ 乌克兰和性暴力受害者妇女协力组织提交的材料。

⁶⁵ 援助政治犯协会(缅甸)、缅甸妇女联盟、彩虹颜色组织和进步之声组织提交的材料。

⁶⁶ 下列组织提交的材料：巴勒斯坦独立人权委员会；以及良心囚犯支助和人权协会、法律援助会、迈赞人权中心、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妇女法律援助和咨询中心、MIFTAH。

⁶⁷ 全球权利合规组织提交的材料。

49. 国际社会迟迟不承认性暴力的发生，导致人们对举报犯罪缺乏信任。⁶⁸ 一些受害者被杀，不能发声。⁶⁹ 匆忙按照文化或宗教习俗有尊严地埋葬尸体⁷⁰ 可能会销毁重要证据。要克服这一点，可能需要允许法律或宗教例外，以推迟埋葬。尸体解剖或迅速收集照片和其他法医证据可能需要家庭成员的允许。

50. 一系列社会和心理反应，诸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回避/分离，以及由于真实或感觉到的污名，或害怕遭到家庭或社区的报复等，进一步阻碍了透露性酷刑的经历。⁷¹ 在苏丹，有人提出，妇女由于恐惧以及与强奸相关的耻辱而自杀。⁷² 在埃塞俄比亚，有人提出，幸存者不报告他们受到的侵犯，因为丈夫在得知妻子受到性侵犯后与妻子离婚是很常见的。⁷³ 男性受害者可能认为透露会损害他们的男子气概。⁷⁴ 在同性关系被定为刑事犯罪的地方，他们可能担心会遭到起诉。⁷⁵

51. 幸存者可能担心他们的信息不会保密。在知情同意和有效调查之间取得平衡，应始终有助于保护受害者，使他们感到举报这些罪行是安全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概述了卫生专业人员尊重病人自主权和隐私以避免伤害的基本道德义务。要求提供信息的法院或当局必须遵守保密的医学道德。⁷⁶ 至少，所有与幸存者打交道的人都必须制定保密协议和措施，以保护幸存者的信息、隐私和安全，包括特别注意确保任何数字通信、数据管理和存储的安全。⁷⁷ 例如，在乌克兰，受害者可要求对其个人资料采取安全措施，而“怀疑通知”(指控文件)不指明犯罪的具体地点，以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公开、谴责或污名化。⁷⁸

E. 证据收集

52. 性酷刑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或两种伤害都有。过度依赖或要求提供在冲突期间实施的性酷刑的物证会导致不公正。事实上，缺乏冲突中性酷刑的物证是正常的。

⁶⁸ 耶路撒冷司法研究所提交的材料。

⁶⁹ 以色列以及政治犯援助协会等提交的材料。

⁷⁰ 下列方面提交的材料：Dinah 项目(以色列)；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访问报告：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对以色列和被占领的西岸的正式访问》，2024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4 日，第 46 段。

⁷¹ 马特和平、发展和人权基金会提交的材料，以及《伊斯坦布尔规程》，第 274-276 页。

⁷² 促进透明伙伴组织提交的材料。

⁷³ 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⁷⁴ 叙利亚法律发展方案提交的材料。

⁷⁵ 所有幸存者项目提交的材料。

⁷⁶ 《伊斯坦布尔规程》，第 172 段。

⁷⁷ 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收集和使用关于系统性和与暴力有关的性暴力信息的全球行为守则》(《穆拉德守则》)，2022 年 4 月 13 日，原则 7.8。

⁷⁸ 乌克兰提交的材料。

53. 在持续武装冲突及其后时期的局势中收集证据尤其具有挑战性。正在发生暴力的地区可能被占领、受到攻击、埋有地雷或因其它原因而无法进入。从实施犯罪到进入犯罪现场之间的时间可能很长，导致有形证据变质和消失。施害者可能会试图通过轰炸或纵火焚烧建筑物或尸体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医疗和法医基础设施可能被摧毁或严重损坏，而且法医小组可能不堪重负。

54. 用于收集法医证据的强奸案证据收集包往往不存在或难以获得。只有少数受害者可能有身体伤害，即使这样，这些伤害可能在几天内愈合。⁷⁹ 冲突中施害者的身份可能不明，这可能限制 DNA 证据的直接有效性。

55. 虽然许多性酷刑行为是身体上的，但有些行为，如被迫目睹对家庭成员或其他被拘留者实施的性暴力，是为了心理折磨。⁸⁰ 《伊斯坦布尔议规程》规定了对所有形式酷刑的物证进行法医评估外，如何进行心理评估并记录在案。⁸¹ 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进行的评价应被纳入诉讼程序，无论这些评价是由私人还是国家法医从业人员进行。

56. 在性酷刑调查中收集的证据形式包括受害者、证人和嫌疑人的证词；物证（包括从受害人的身体检查中收集的物证和从某一地点收集的物证）；数字证据（诸如视频和照片、卫星图像、开源信息）；文件证据（正式文件和非正式文件）。间接证据和证词是战时罪行最常见的证据形式，只要可靠可信，就足以证实罪行。德国采用的办法侧重于武装冲突或危害人类罪的总体定性，使受害者不必提供关于其在个别案件中遭受的苦难的详细信息。⁸²

F. 与幸存者和目击者进行面谈

57. 与性酷刑幸存者进行面谈需要技巧、培训和情商。面谈的进行情况可能是信息被认为可靠与否之间的区别。⁸³ 这可以确定幸存者是否愿意分享他们的经历。如何收集证词可以对任何刑事诉讼的结果，公平性和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⁸⁴ 必须尊重所有受访者——受害者、证人和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并根据具体的脆弱性作出调整。制定面谈的框架可能对如何指控罪行以及这些罪行是否被视为酷刑有很大的影响。

58. 建立融洽关系是面谈的重点，受害者应选择他们希望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经历。面谈者必须接受培训，以合乎道德和可靠的方式获取敏感信息，不受任何议程的影响，同时不会对受访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或安全风险。他们应该提出开放式的问题，让受害者有时间回答。幸存者应该带头讲述他们的故事，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得到提示。在挪威，如果发现贩运人口、家庭暴力、强迫婚

⁷⁹ 《伊斯坦布尔规程》，第 463 段。

⁸⁰ 妇女争取性别公正倡议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⁸¹ 见 [A/69/387](#)，关于法医在酷刑中的一般作用。

⁸² 德国提交的材料。

⁸³ Benjamin Lucas 和 Becky Milne 提交的材料。

⁸⁴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培训工具 1/2017：刑事案件调查性面谈，第 1 页。

姻或残割女性生殖器的迹象，移民面谈人员会调整面谈和提问策略，并可能请具有适当专门知识的面谈人员参加。⁸⁵ 他们必须被告知面谈的目的以及进行面谈的方式。他们有权享有国际法规定的全部权利。⁸⁶

5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在与妇女和男子进行面谈时采取了不均衡的做法。女性战争幸存者经常被问及有关强奸的问题，这可能导致她的经历被狭隘地归类为强奸而不是酷刑，或者这种询问可能没有给她提供机会谈论她的全部经历，包括其他潜在的罪行。不应假定性暴力是幸存者最关心的侵权行为。必须让幸存者有机会分享他们的全部经历。为了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调查人员必须熟悉所有可起诉的罪行。男性通常有不同的经历，并有机会充分解释他们的故事。在这种更全面的面谈之后，这些性侵犯的经历往往被归类为酷刑或不人道的待遇。

60. 只要有可能，幸存者就应该能够选择面谈者的性别。⁸⁷ 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同性别、同种族和同宗教的人的面谈——尽管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并非总是可能的，而且不应被预先推定。⁸⁸ 特别是在幸存者被关押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面谈者是一名临床医生，而幸存者可以向他提出诚实的问题。⁸⁹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口译员，他们应该接受培训，充分了解文化和语言的细微差别。使用不显眼的耳机进行同声传译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这可以避免口译员分散幸存者的注意力，从而导致记忆中断、误译和潜在的融洽关系破裂。⁹⁰

61. 如果面谈进行得不好，可能会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但如果面谈进行得好，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受害者恢复。⁹¹ 调查人员往往是第一个听到幸存者故事的人。⁹² 当医生接受到以幸存者为中心并且对创伤知情的方法的培训时，法医评估可以带来验证、宽慰和希望。⁹³ 在调查小组中安插心理学家可确保不断进行评估和调整。⁹⁴

62. 如果调查人员受过良好的培训，就可以避免与幸存者重新面谈，从而减少再次创伤的风险。将问题集中在嫌疑人的行为上，有助于克服传统上侧重于受

⁸⁵ 挪威提交的材料。

⁸⁶ 见《为调查和收集信息进行有效面谈的原则》，2021年5月，原则2；大会第77/209号决议，第16段。

⁸⁷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警察资源工具包，第7.3章，《调查性犯罪》，2024年，第6页。

⁸⁸ 欧洲委员会，“与武装冲突期间性暴力幸存者打交道：乌克兰心理健康和应急专业人员手册”，2022年，第48页。

⁸⁹ 《伊斯坦布尔规程》，第283段。

⁹⁰ Benjamin Lucas 和 Becky Milne 提交的材料。

⁹¹ 同上。

⁹²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警察资源工具包，第7.3章，《调查性犯罪》，2024年，第6页。

⁹³ “协力促进正义”组织提交的材料。

⁹⁴ 医生促进人权协会提交的材料。

害者行为的误解(诸如归咎过错)。⁹⁵ 如果面谈的目的是帮助获得康复、补救或赔偿,面谈者应询问有关痛苦和损害的问题。

63. 虽然最好是当面谈,但在受冲突影响地区或接触幸存者的机会有限的地方,远程面谈也可能有用。⁹⁶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进行全面的威胁和风险评估之后,才应进行远程面谈。应提供社会心理后续行动和其他支助服务。⁹⁷

64. 与儿童面谈需要更多的专门知识来解释他们的认知、语言和情感发展情况。《伊斯坦布尔规程》警告说,没有专门知识的临床医生在评估儿童时必须谨慎。⁹⁸ 当局应培训更多的人来妥善开展这项工作,以确保在儿童寻求正义和康复的道路上迈出这一困难但重要的一步。

65. 酷刑受害者、包括性酷刑受害者的面谈者,在认知和情感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幸存者和面谈者都需要休息、朋友或支持者的存在以及安全的环境。录音面谈可以减轻面谈者承受的认知负担,并提供更准确的证词记录,可以成为审判中的关键数字证据。面谈者可能会通过倾听可怕的经历和目睹性酷刑的影响而遭受二次创伤。⁹⁹ 面谈者和口译员也可能经历与战争有关的直接创伤。¹⁰⁰ 通过适当的培训和持续的支持,可以降低高倦怠率。

G. 了解罪犯行为以加强预防

66. 尽管国际和国家两级对教育和培训进行了投资,调查和起诉也在增加,但战时性犯罪和酷刑仍在继续,而且往往不受惩罚。虽然追究这类罪行的责任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但需要充分解决性酷刑的根本原因和催化因素。

67.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被归咎于厌女症、不平等和歧视。它通过贬低妇女价值和确立男性主导地位的法律、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制度而得以延续。这些性暴力的驱动因素存在于平民生活中看似“安全”的环境中,但在战时被放大和释放。施害者利用性别规范和权力关系增加受害者的痛苦。¹⁰¹

68. 在冲突局势中,还有其他原因使得酷刑得到实施、容忍甚至鼓励。这包括在政治和经济上加深分歧和仇恨,有选择地以受害者为目标,以煽动恐怖和控制,唆使他们离开某些地区,并破坏社会凝聚力。酷刑——及其性形式——被用作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与其他形式的酷刑一样,它可能被用来压迫、征服、控制和报复。使用或威胁使用性酷刑可能伴随

⁹⁵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警察资源工具包,第 7.3 章,《调查性犯罪》,2024 年,第 7 页。

⁹⁶ 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远程面谈准则》,2021 年 8 月,第 3 段。

⁹⁷ 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国际刑事调查研究所远程面谈准则》,2021 年 8 月,第 6 段。

⁹⁸ “协力促进正义”组织提交的材料;《联合国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手册》,2002 年,第 284 页。

⁹⁹ “协力促进正义”组织提交的材料。

¹⁰⁰ 同上。

¹⁰¹ DIGNITY 组织提交的材料。

着一种错误的信念，即认为这将有效地获取情报或供词。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其他方法失败的情况下，这种特别极端、痛苦和羞辱性的酷刑形式就会成功。¹⁰²它可能被用作威胁升级的一种形式。

69. 一些恐怖主义实体采取了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政策，允许某些形式的性暴力，包括性奴役和童婚，从而界定哪些人可以成为目标，并规定了可以实施暴力的条件。¹⁰³ 强奸也可能被用来“补偿”或“奖励”部队，特别是当士兵的薪水不足的时候。¹⁰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慰安妇”、¹⁰⁵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期间经营的强奸酒店¹⁰⁶ 以及对伊黎伊斯兰国幸存者的性奴役都具有这种性质。

70. 从事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可能是国家军事或政治战略的一个明示或暗示的组成部分。这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或者通过有意表示许可的语言。¹⁰⁷

71. 为什么酷刑变得性化，可以理解为植根于男性应享性权利的意识形态。¹⁰⁸ 战争是对平时期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极端破坏。¹⁰⁹ 更广泛地说，许多军事文化的特点是普遍的厌女症，鼓励“强奸文化”，甚至对军队自己的女兵也是如此。¹¹⁰ 在战争期间，用“我们对他们”或“生与死”的群体心态鼓励男子气概。顺从意味着生存，排斥就带来死亡。¹¹¹ 多名施害者强奸被用来建立部队内部的凝聚力，或在由强行招募的没有天然凝聚力的个人组成的部队中建立忠诚。¹¹²

¹⁰² Christopher J. Einolf, 《为什么国家对政治犯使用性酷刑？来自萨达姆·侯赛因的监狱的证据》，《全球安全研究学刊》，3：4，2018年10月，第419页。

¹⁰³ Mara Redlich Revkin 和 Elisabeth Jean Wood, 《伊斯兰国的性暴力模式：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和实践》，《全球安全研究学刊》6：2，2021年：第15页。

¹⁰⁴ Elisabeth J. Wood, 《战争期间的强奸并非不可避免：战时性暴力的变异，理解和证明国际性犯罪》，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 2012年，第414页。

¹⁰⁵ 见亚太地区检察官和人民诉 Showa 等人案，PT-2000-1-T，2002年1月31日。

¹⁰⁶ 见检察官诉 Kunarac 等人案，IT-96-23-T 和 IT-96-23/1-T，2001年2月22日。

¹⁰⁷ Mayesha Alam 和 Elisabeth Jean Wood, 《意识形态与暴力作为政策的隐含授权：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实施的与暴力有关的性暴力》，《全球安全研究学刊》，7：2，2022年，第8页。

¹⁰⁸ 联合国关于男性与暴力的多国研究，《为什么有些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以及我们如何预防》(2013年)。

¹⁰⁹ Inger Skjelsbæk, 《保护还是预防的责任？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和施害者》，《全球保护责任》，4(2)，2012年，第164页。

¹¹⁰ Helen Benedict, 《为什么士兵们强奸》，《在这些时代》，2008年8月13日。

¹¹¹ Susan T. Fiske、Lasana T. Harris 和 Amy J.C. Cuddy, 《为什么普通人折磨敌人的囚犯》，《科学》，306：5701，2004年11月26日，第1482页。

¹¹² Dara Kay Cohen, 《解释内战期间的强奸：跨国证据》(1980-2009)，《美国政治学评论》，107:3，2013年8月，第461-477页。

72. 对冲突期间性暴力领域施害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性酷刑的施害者。只有少数施害者是虐待狂和精神病患者。¹¹³ 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酷刑实施者有犯罪倾向或患有精神病，但表明社会结构、情形和社会心理压力因素导致“普通人”成为酷刑实施者。¹¹⁴ 导致人们成为酷刑实施者的因素包括：服从权威、训练、操纵恐惧、愤怒和报复情绪，以及对酷刑实施者和受害者的非人化和非个人化。¹¹⁵

73. 试图了解施害者的动机或刺激因素并不是为了在刑事责任方面原谅他们的行为。尽管如此，如果要彻底根除酷刑及其性表现形式，了解犯罪者的行为，特别是在大规模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对于今后防止各种酷刑和确保干预措施有正确的针对性至关重要。

H. 从性酷刑中恢复

74. 赔偿旨在全面处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必须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酷刑受害者的康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和伊拉克等一些国家，有针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的赔偿方案，只是利用这些方案可能很困难。¹¹⁶

75. 在伊拉克，开创性的《2021 年雅兹迪女性幸存者法》为雅兹迪、基督徒、沙巴克和土库曼的性暴力和其他伊黎伊斯兰国罪行女性幸存者提供了赔偿框架，但该法(尚未)承认强奸所生儿童有资格获得赔偿，也没有供男子和男童采用的程序。¹¹⁷ 在乌克兰，在拟订适用于遭受俄罗斯部队性侵犯者的赔偿法草案方面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支持紧急避孕、安全堕胎服务和接受性传播感染检测的机会。¹¹⁸

76. 2024 年，乍得政府在长期拖延之后开始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但迄今为止，非洲特别法庭裁定的赔偿金总额中只有 10% 已发放。¹¹⁹ 国际刑事法院最近下令向 **Dominic Ongwen** 的受害者支付赔偿，并认为基于社区的赔偿措施是最适当的。¹²⁰ 萨尔瓦多有一个针对女性受害者的赔偿方案，规定在健康权、教育权、食物权和

¹¹³ Alette Smeulers, 《国际犯罪的施害者》, <https://alettesmeulers.org/en/perpetrators-of-international-crimes/>。

¹¹⁴ Einolf, 《为什么国家对政治犯使用性酷刑?》第 419 页。

¹¹⁵ 同上。

¹¹⁶ 全球幸存者基金提交的材料。

¹¹⁷ 吉扬人权基金会和正义赔偿联盟提交的材料。

¹¹⁸ 乌克兰和 ZMINA 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¹⁹ REDRESS 提交的材料。

¹²⁰ 同上。

参与经济生活权等领域提供康复。¹²¹ 在肯尼亚，由于国家未能调查、起诉和结束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法院下令进行赔偿。¹²²

77. 在国家将康复纳入其更广泛的赔偿方案的为数不多情况下，存在重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完全依赖由民间社会组织实施和支付费用的康复服务，同时要求受害者提出或参与刑事申诉才有资格，或对受害者具备资格适用过高的证据标准。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可能是一般性的，而不是专门的。通常只有少数受害者可以利用这些方案。对女性受害者的特别关注可能会排除并因此忽视其他受害者的经历。当幸存者获得服务时，性侵犯幸存者往往遭到恶劣对待，受到嘲笑或进一步的羞辱。在赔偿登记方面存在资金短缺和时间限制。¹²³

78. 为本报告进行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康复做法是在服务提供者一级与受害者、其家人和社区直接接触。特别报告员确定了下列有效的康复办法。

(a) 承认和认可：幸存者寻求承认作为治愈之路。任何赔偿法律都应规定幸存者可诉诸的程序，而不论其性别、年龄及族裔或宗教群体。

(b) 与受害者一起制定对策：充分、迅速和有效的赔偿必须是所有受害者的优先事项。这使他们能够开始重建他们破碎的生活。感觉得到倾听和认可是治愈的根本。虽然康复是赔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害者也有权获得全面和整体的赔偿。尼日利亚设立了性暴力问题特别审判小组，让受害者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进行调查并给予赔偿。¹²⁴ 赔偿的设计、执行和影响应具有变革性。¹²⁵ 赔偿如果能解决结构性不平等、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歧视以及作为性暴力根源的其他因素，就是最好的。在尼泊尔，执行国家行动计划的小组委员会打算让代表冲突双方的两名受冲突影响的妇女与政府官员一道加入。¹²⁶ 在科索沃，性暴力受害者身份核实和认可委员会的成立令幸存者感到满意，并在承认他们所经历的创伤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¹²⁷

(c) 使幸存者能够寻求帮助而不透露：一般康复服务中的支助措施可以针对酷刑、包括性酷刑的典型后果。可以利用小组安抚活动来创造安全和支持性的空间，使幸存者可以谈论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与家人或社区讨论的问题。例如，在以色列，卫生系统提供以创伤为重点的治疗，但有一项谅解，即有些

¹²¹ 萨尔瓦多提交的材料。

¹²² Utu Wetu Trust 提交的材料。

¹²³ 见 AL OTH 18/2021(科索沃)，2023 年 3 月 1 日，第 6 页，<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909>。

¹²⁴ 尼日利亚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¹²⁵ 联合国，秘书长的指导说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赔偿问题，原则 4，2014 年 6 月。

¹²⁶ 人权和司法中心及冲突妇女全国网络(尼泊尔)提交的材料。

¹²⁷ 科索沃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提交的材料。

受害者可能在寻求治疗时并不宣称自己受到性侵犯。¹²⁸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理疗师可以在不容忍或无法进行妇科检查的情况下提供盆腔治疗。¹²⁹

(d) 根据幸存者的需要和情况提供服务：康复服务应是整体的，并应与受害者合作制定、实施和监测。¹³⁰ 这些服务应以幸存者为中心，并根据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所经历的伤害类型等因素定制。一些受害者的优先事项可能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¹³¹ 服务提供者应确保男女工作人员都在场，以支持幸存者。社区外联和远程保健可确保地理覆盖范围和不希望被认出身份的受害者的隐私。在阿富汗，保健服务的减少以及与幸存者相关的极端社会污名意味着一些人不得不寻求国外的医疗和社会心理照护帮助。¹³² 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服务提供者正在帮助一些遭到家人排斥的性酷刑受害者，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¹³³

(e) 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与性酷刑受害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必须接受全面照顾受害者的专门培训。这包括评估、查明和了解性酷刑的影响。他们应使用敏感的语言，并了解与针对不同个人的性暴力有关的文化陈规定型观念。这种了解必须融入临床实践，以防止指责受害者和潜在的再次创伤。

(f) 安全和保密：所有与性酷刑受害者打交道的康复专业人员必须优先考虑幸存者的隐私权及其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康复环境必须安全并起到支持作用，并应增强幸存者的权能。

(g) 受性酷刑影响的儿童：对于因作为一种酷刑或相关虐待形式的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来说，还有其他具体的挑战。这些因素需要融入康复和赔偿方案，诸如获得出生证、合法身份和国籍。缺乏身份证明可能阻碍他们享有基本权利，包括接受教育以及获得卫生保健、财产或继承权。

三.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行动呼吁：为什么酷刑框架有用且适用

79. 特别报告员认为，在考虑战时和其他安全局势中的性侵犯问题时，酷刑框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对受害者尤其如此。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上已经开展了许多重要工作，但这一罪行仍在得到无情地实施。几乎不可能找出不构成酷刑或相关虐待特征的剧烈疼痛或痛苦的战时性暴力案件。特别报告员澄清了国际禁止酷刑的现实意义、适用性和益处，如下所述。

¹²⁸ 以色列提交的材料。

¹²⁹ 酷刑受害者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³⁰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实施工具第 5/2018 号，为酷刑和其他虐待受害者提供康复服务，2018 年，第 3 页；黎巴嫩人权中心提交的材料。

¹³¹ 下列组织提交的材料：生殖权利中心和全球正义中心；全球正义中心、人权观察、国际项目援助方案社影响网络；医生促进人权协会。

¹³² Azadi-e Zan 提交的材料。

¹³³ 提格雷妇女协会提交的材料。

(a)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禁止酷刑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因此可以用性暴力框架无法做到的方式保护受害者。习惯国际法绝对禁止酷刑，即使在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也不得减损。这种罪行的强行法性质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这种暴力。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不能对起诉或康复实施时间限制。任何人都不能行使豁免权。大赦是不适用的。确定了对受害人和证人的明确保护；并且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以及起诉或引渡的义务是明确的。简而言之，性酷刑施害者无法逃脱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他们将面临最严厉的惩罚。

(b) 酷刑框架的包容性：安全理事会第 1325 (2000) 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承认，如果妇女在和平进程、重建和安全中没有真正和切实的代表权和参与，就不可能有和平。然而，这种对妇女和女童的关注可能会将战时性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其他受害者排除在外。这种排除可能扭曲现实，误判问题和挑战，并导致不公正的政策和其他应对措施。尽管妇女和女童仍然面临特别大的风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任何人都可能在战争中面临性酷刑的风险，其中包括平民、士兵、妇女、男子、儿童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酷刑框架适用于并承认任何遭受这些形式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人。

(c) 耻辱：成为酷刑的受害者并不可耻。受害者不受指责。将冲突中的性暴力定义为性酷刑，就将耻辱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到施害者身上。政治、宗教和社区领导人也将更有能力通过呼吁施刑者、帮助社区支持幸存者而不是指责他们来减少受害者的耻辱和污名。

(d) 同意：武装冲突是一种胁迫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选择和自主权受到严重限制，个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武装控制。在这种环境中，无论是涉及强奸、奴役还是其他类似的性侵犯行为，同意问题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对比之下，同意问题不是国际酷刑罪的一个要素，因此也不是战时性酷刑罪的一个要素。这可以减轻法律程序和幸存者在这些多余问题上承受的负担。

(e) 收集证据、面谈和调查：在冲突中性暴力中，如同在酷刑中一样，证词往往是主要证据。如果调查人员只专注于法证，所发生事情的情形就可能会丧失。遵循酷刑面谈和调查的既定最佳做法将有助于确保所犯的所有罪行都得到认定和起诉。性酷刑很少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性酷刑往往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受害者需要能够自由谈论他们所经历的所有侵犯行为，以确保他们的全部经历得到倾诉，施害者对所有罪行的责任得到追究。

(f) 康复：很少有条约规定康复的义务。《禁止酷刑公约》第 14 条规定受害者有权得到康复和赔偿。这些义务是清楚明白并且明确的。

四. 建议

80. 特别报告员请各国参考她在上一份报告(A/HRC/52/30)中提出的建议。此外，特别报告员建议：

(a) 政治、军事、宗教和社区领导人公开反对战时性酷刑，为此发表公开声明，承认所有幸存者的污名并帮助予以消除，将耻辱转移到施害者身上，包括将他们定为刑事犯罪，进行调查，并予以起诉和惩罚。

(b) 幸存者作为权利持有人，在制定影响他们的所有政策和法律过程中不应仅咨询他们的意见，而且应把他们视为影响他们的所有政策和法律的共同制定者。

(c) (军事和民事)立法应涵盖各种性犯罪和其他与酷刑有关的犯罪。应清楚地提到性形式的酷刑。应允许多重指控，因为这种方式反映了犯罪行为的真实程度。¹³⁴

(d) 国家和军队对包括性侵犯在内的酷刑采取零容忍政策；纪律守则应得到每一名士兵和军官的认可，并通过行为模拟和领导力训练进行灌输；教育士兵和军官了解酷刑的原因、后果和禁令，其中包括强奸和其他各种性侵犯行为构成酷刑或其他故意犯罪；促进招募更多女兵和女军官；以及禁止招募有家庭暴力或性暴力背景的士兵和军官。

(e) 所有与幸存者打交道的公共当局都以尊重和认可的态度对待他们，并制定了投诉程序和纪律措施，以处理不尊重幸存者的当局。

(f) 调查小组采用假定会有性酷刑案件的工作方法，并制定指标，以帮助确定侵权行为的规模和程度以及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伊斯坦布尔规程》，性暴力(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指控应作为酷刑或其他与酷刑有关的罪行记录在案；法院接受符合《伊斯坦布尔规程》的医疗报告；法医小组配备强奸案受害人救助包和其他法医检测资料；受害者能够安全和保密地获得预防药和全面的生殖保健服务，包括堕胎服务以及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和怀孕检测。

(g) 对面谈人员和口译员进行《为调查和收集信息进行有效面谈的原则》(《门德斯原则》)和，《收集和使用关于系统性和与暴力有关的性暴力信息的全球行为守则》(《穆拉德守则》)方面的培训和认证，并注意到关于面谈性酷刑幸存者和证人的专家要求；并对同意、保密和匿名信息采取保护措施。

(h) 通过赔偿法并为之供资，为酷刑和其他类似侵犯行为的所有幸存者提供赔偿和康复。

(i) 所有保护、医疗和法律支助服务都以综合方式在一个地点提供，以减轻幸存者自己推动这一流程的负担，而且这种服务不应取决于是否透露了性酷刑。

¹³⁴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提交的材料。

(j) 各国加强国家间合作，包括为此执行《禁止酷刑公约》第 9 条中的法律互助规定。

(k) 参与收集有关战时罪行信息的各种行为体(国际和国家两级)协调其活动，以尽量减少对幸存者的再次创伤，并减少后来被评估为前后不一致的言论的可能性。

(l) 各国进一步研究施害者的行为，并承诺制定一切措施，消除根源和催化因素。
